

內容

作創·述譯·摘文

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意見	陶百川
日本將有一次革命	桑榆譯
陳立夫先生訪問記	楊家麟
再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王芸生
眼前的國際局勢	龍章等
一，許大使下旗歸國	
二，敵已示弱	
三，日寇竭澤而漁	
四，法新閣之將來	
失地的政治工作	王健民
國防前線之外蒙古	李慶錫

本期刊目

關於民主政治之論爭	本社特輯
一，關於民主政治	葉青
二，抗戰和民主的關聯問題	曹伯韓
三，國家戰時軍治化	大公報
四，反映民意與抗戰前途	韋
中國一船孃	浦滋譯
大戰前夜之鄭州	舒溼
不堪回首話平津	漢申
韓案面面觀	記者
從上海到武漢	施仁政
一個外國人在虹口火線	張常譯
中的日記	

售價五分
 預定半年
 一元一年
 兩元
 社長 陶百川
 編輯人 龍章
 發行人 楊堅
 通訊處 武昌候補街廿四號

總經售處 中華圖書公司
 漢口湖北街四二四號

血路週刊

第三四期合刊

願我們
 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
 走光明的「路」

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意見

陶百川

從抗戰發生到現在，國內一直有「民主政治」的呼聲，但其要求的內容，前後頗有不同。在國戰發生之後，那時祇是一個單純的呼聲，並沒有什麼具體的要求。這可以施復亮先生在文化戰線上一文做代表。這是民主運動的第一個時期。嗣後輿論界慢慢對此提出具體的辦法，並多以設立民選的民意機關為其中心，一唱百和，甚囂塵上。這可說是第二個時期。及至上海陷落，這個運動似乎普遍的冷淡下去，直到最近，輿論界才又熱鬧起來，然其要求則與第二期大有出入，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已經沒有人再要求什麼民選的民意機關了，祇有大公報和韜奮先生提出一些新意見。我們為傳讀者明瞭這個問題的全貌，不憚煩的搜集了四篇重要的論文，轉載於此，並由我和國民黨一位老同志合作了這篇代表本刊的文字。祇是時間匆促，而我又公私兩冗，不能暢所欲言，如有挂漏或錯誤之處，應由我負責任，並請讀者和那位老同志原諒，指教！

「先生對於黨派問題的高見，我們已經領教了，現在大家很想知道先生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可否容我再和先生談一次？」我很誠懇的問。

「當然可以」。這先生的回答。「這也是一個很有趣而很重要的問題，我極願追隨全國輿論界之後，貢獻一些意見」。

「大家最想知道的一點，恐怕是國民黨對於民主政治的態度吧」，又先生接着說。「其實那是很明顯的，因為國民黨是最主張民主政治的，不僅主張而已，他為爭取民主政治不知流了幾多志士仁人的汗血。你是知道的，同盟會四綱，第二條就是「建立民國」；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不獨主張主權在民，並且發明施行民權的最好辦法，（按即「人民有權，政府有能」）；而且人民不獨有選舉權，還有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雖在程序上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然軍政訓政祇是達成憲政的

手段，祇是憲政時期的過渡，其終極目的是在實行憲政或民主政治。假使去年中日戰爭不爆發，國民大會恐怕早已召集了，國民黨恐怕早已選政於民了，憲政時期恐怕早已開始了。我再鄭重的說一遍：國民大會是民主政治的」。

「我想先生所說的民主政治，或國民黨所主張的民主政治，與歐美式的民主制度顯然不同。一般迷信歐美式民主制度的先生們，對於我們所主張的民主政治，不知是否滿意？換句話說，現在民主運動者所追求的對象，和我們所主張的不知是否吻合？」這或者是我的過慮。

「這個我想不應該成問題的」，又先生說，「我們所主張的民主政治，無論在理論上或辦法上，都較歐美式的民主制度高超而周密，這是全部的民權主義，是民主主義者所應當信仰的。而況現在也沒有主張歐美式的民主制度，韜奮先生並且表示

反對，他在「反映民意與抗戰前途」中說：「有些人談起民主兩個字，就很自然的聯想到英美等民主制度的國家，聯想到他們的議會，聯想到他們的選舉。……記者以為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民主，並非抄襲英美等國的通常文章，也不是主張要在這樣緊急的時期用選舉來建立議會」。大公報也說：「在對日抗戰的國家的現況下，黨治已嫌不夠，民主亦還迂遠，主要的是加強國家在戰時的軍治化」。現在國內似乎沒有人，（至少就發表了的意見來說），還在主張歐美式的民主制度」。

「話雖如此，可是問題仍沒有解決；因為國民黨所主張的民主政治，現在還沒有實行，所以黨外才有民主的要求」。我進一步問。

「你說得有理。但是現在有什麼辦法呢？假使大家逼着國民黨要民主政治，我想國民黨祇有召集已經選出的國民大會的代表，舉行國民大會，照建國大綱的規定，由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實行憲政。然而這是可行的麼？要得的麼？而且與抗戰前途又有多少幫助呢？」又先生說。我認爲他也說得有理。

「我想現在沒有人要求召集國民大會吧，同樣的理由，現在也不必召集什麼別的代表會議——民意機關。更不必急着要制定憲法，選舉總統！我們祇須在現有的軌道上加緊工作，不必另起爐灶。所以現在說，國民黨的民主政治是平時的事，將來的事，不是現在戰時的事。假使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那麼目前的民主運動有什麼意義呢？」

「你對韜奮先生的主張有什麼意見？我想他的主張是目前民主運動的最新最具體的要求了」。我

日本將有一次革命

桑榆譯

本文原作者是孟斯脫斯敦的記者，在去年十月裏，曾在東京以及日本各地作三星期旅行，最近才回到上海。（本文譯自一月十四日香港的「南華晨報」。）

在日本，在日下的任何場所中，已沒有言論自由可講。任何一個日本人，（事實上，任何一個外國人，對於這一件事上，也有同樣的束縛），倘若對於戰事想發表點意見，必須特別謹慎，只要說一句「希望和平」而這一種「和平」如果並不是指着日本的全勝利後的和平的話，那就是一種不可救的罪孽了。我會聽過一段故事，據說有一

而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淚，他就因此吃了「刑事官司」，而且立刻被判槍決。（我也許可以更申述：倘若有一個人把我上面所述的一個故事，在日本向人再述一遍，他就應該被處罰徒刑五年。）另外還有一位日本人，他的妻子已經死了，留下了兩個孩兒，當他被徵赴中國之前，他先用槍打死了他的兩個兒子，然後默默地披了軍裝上路。但是，倘若他向人說出他的苦衷——他當兵之後，沒有人來看管他的「子們」——他自己就有殺身之禍。

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空氣中，日本向中國作不宣而戰的侵略！

每一個都市，鄉村，城鎮，以及每一個工廠，銀行，百貨商店，小舖子或者每一個家庭中，都掛着旗幟或標語，上面寫着「皇軍萬歲！」「為天皇及皇軍祈禱得勝而歸！」這一類的頌詞，竟是完全

相同的。有人告訴我！他們在未排或未貼之前，必須先得軍部的許可。所以，這簡直是不足為奇的：在公共場所，類如車站上送軍的時候口喊「萬歲」等等的愛國心的表現，都是機械的而不是從心裏自發出來的。

在戰事開始的時候，一個某中學校長對他的學生說過這樣的話：「在這次吾國對中國作戰，你們是不會曉得真實的事實的。但是，你們也不必來問我，因為我也不曉得這些；而且，你們的父親也不會曉得，你們的哥哥也不會曉得。我們所曉得的，只是政府需要我們曉得的一些，而這一些是需要我們信以為事實的。」這種說利而透澈的話，也祇有少數的人敢說。但是，自從戰事開始一直到現在，這位校長先生的話却永遠是一種真理。戰事的消息直是謠說，毫無邏輯可言。倘若以每天讀報所得為準，中國的軍隊簡直從來沒有勝利過，換一句話說，日本也從來沒有遇到抵抗。前線的通訊更是

言過其實，出乎情理之外。譬如：一次中國空軍根據地遭日機空襲，必說：全機場被燬，機場上所有之飛機亦被炸盡。而第二天的報告，這同一的中國空軍根據地又遭日機空襲，同樣也是全機場被燬，飛機掃數炸燬。然而沒有人敢對此懷疑的。

在我就擱日本的三星期中，我讀到：蔣介石將（下文轉第五十頁下左角）

又提出一個新問題。

「我對他的主張很表同情。這些都是政府現在逐漸在實行的。試看第一項，「在現有的政治機構中應有反映民意的機關。這機關的組織方法，可由政府根據實際可用的辦法，用簡單而迅速的手續，成立起來，最重要的一點是這裏面所容納的份子，須能代表全國各方面對於國事的意見，反映大多數民衆的意志，以備政府的採擇。」——這種「反映民意的機關」，不就是現在的國防參議會麼？這是抗戰發生以後政府用「簡單而迅速的手續成立起來」的；他的份子都是各黨派和各方面的領袖，論理是應該能「代表全國各方面對於國事的意見，反映大多數民衆的意志」的。聽說現在快將從三十餘人擴充為一百人，將來當然格外能够「反映民意」。至於第二項，「關於抗日及善意批評政治的言論自由。……當然，這種善意的批評與建議，亦應以與抗日有利為前提」；又第三項，「組織抗日團體的自由。……但是這種組織，必須在政府領導之下進行」，——這兩項主張，正是政府的既定方針，而在事實上政府也沒有取締「抗日及善意批評政治的言論」，或不准人民「在政府領導之下」組織抗日團體」。假使這三項就是民主運動的全部主張，那麼民主運動可以說是完全勝利了，以後不必再鬧什麼民主運動了。」X先生滔滔不絕的說。

「大公報記者的主張呢？他倡導「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他說：應該「充實大本營的組織，舉凡政治軍事一切歸其統率，一切聽其指揮，而一切統率指揮皆以軍事利益為依歸」。我問。

陳立夫先生訪問記

楊家麟

自抗戰爆發以來，戰區教育機關多已無形停頓，一般教職員和學生，轉徙流離，榜徨失措。我們對於目前的救濟和將來的善後問題，多想一閱政府的方針。同時，在抗戰期間，社會各方面暴露了許多弱點，其中有許多是間接的或直接的與過去的教育行政有關係，而補偏救弊，也不能不有待於將來的教育。因此，我們特地去訪問新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探詢他對於上述問題的意見。

陳先生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然其頭髮已白了十分之七八，這是說明了他對政治工作和社會事業的憂勤。他那清秀的面貌，文雅的態度，溫和而懇切的語調，假使未曾聽人介紹的話，你萬不會想到他就是統治着中國的一個革命黨的極重要的負責人，相反的，你將估量他是一個學者，一個專家。

我們約定的會見時間，是在晚上九點半。因為陳先生很忙，我一見面就問：「目前戰區教職員與學生，轉徙流離，流亡載道，救濟安輯，端賴政府。同時後方教育機關，亦覺岌岌風聲，絃誦不甯。先生受命於亂離之中，對於屆時救急之方針，未審有何高見？」

陳先生答：「關於救急辦法，除令飭戰區學校遷地開學或聯合設校外，教部將擇安全地區，大量籌設臨時學校，儘量收容失學青年。對於戰區教職員，除分發各臨時學校任職外，其餘將分別派往川黔各省，擔任社會服務工作。」

「至於安全地帶之教育機關，除呈准許可者外，擅自停頓或變更。」

「一般有志向學之青年，仍應專心學業，力求深造。至於一部份好動的學生，在平時已不能專心致志，此時可聽其參加各種戰時服務，藉以增益其治事經驗與社會常識。」

我接着提出一個根本問題：「教育與國計民生，理應息息相關。自民國以來，我國教育宗旨與教育制度，曾一變再變，惟時至今日，愈覺我國境內歐戰教育之效果，實無補於中國之國弱民困。因此，對於教育的根本問題，敢請略抒高見！」

「教育政策應該以固有的哲學作根據，陳先生說：「各種自然科學理論，雖能放諸四海而皆準，但教育以及一般社會科學的問題，必須依據歷史的地理的哲學的特殊發展，始能解決。」

「我國的歷史發展和歐美的歷史發展，各有不同。因此，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與歐美的社會環境，亦迥然異趣。譬如我們以家庭為社會的單位，以農業為經濟的基礎。而歐美各國則大致以個人為社會單位，以工商業為經濟基礎。基礎既異，其上層建築因之也不能完全相同。乃我國一部份教育家必欲削足適履，拚命效顰，無怪提倡了數十年新教育而仍無補於時艱；反之，在青年方面乃深深的感受了種種不良的影響。舉其大者，約有兩點：

「（一）使青年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和自尊的精神。原來我們先要認識自己的優點，纔覺得自己的可愛，同樣的，我們要認識民族的固有光榮，纔覺

「我很贊成他這個主張。大公報記者說得好：「在民治成熟的國家，到戰時國會尚且停止活動，一切授權於戰時政府，我們在這時還不應該使國家軍治化嗎？」

「軍治與黨治會衝突麼？」我又問。

「我想是不衝突的。」先生答。就法律說，軍事當局受權於黨，這樣的軍治，也可說是黨治。就事實說，蔣委員長是黨的領袖，同時也是政軍兩方面最高的負責人，黨政軍既是三位一體，衝突如何可能？」

最後我又提出軍治或治與民主的關係問題。先生以為「須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全國凝結成爲一個個體，在我們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後，國家政治自然民主化了」。而且「西安事變以後，國民黨的門戶業已加寬，抗戰發動以來，黨治的形態正在刻刻蛻變之中，很明顯的是在逐漸的民主化。各黨各派在這時要共同支持國家的政治中心，團結抗戰，不必呼號民主，國家政治的動態自然趨於民主化」。〈引大公報記者語〉（完）

（接日本將有一次革命）
軍下台了，蔣將軍逃到美國去了，蔣將軍在南昌下野，他的職務由軍事委員會代理了。中國的軍隊（據日本報上所傳說）完全呈瓦解的現狀了，士無鬥志了。惟一的辦法叫中國兵士上前線是把他們縛在大炮上。在華北的中國人竭誠歡迎日本軍隊的行進，希望日本軍部替他們設立一個人民政府；等等無稽之談。這一類的無謂的宣傳，必有牠應得的效果，那就是日本人也就不再相信他們自己的宣傳

得民族有光榮的前途。但我們儘量推行歐美思潮的結果，使許多有用的腦筋都變成歐美文化的殖民地。因此，我們今後不僅要收復有形的失土，同時也要收復這些無形的失地，——被侵略了的腦筋。

「(二)造成大批消費而不能生產的文人。我們在發達優越的都市校舍裏，製造了要在歐美社會機能適用的大批人才，等到畢業以後，社會沒有新式的工業商業以及金融機關來做他們用武之地，於是青年們便只好留連都市，吮吸農村的脂膏以爲自己的供養，而一部份失業的青年乃怨天尤人，馴至弄成社會的不安。

「因此，我主張：(一)應該以中國固有的哲學教育的出發點。我過去一部份的努力，都歸着於一個中心目標，就是要建樹並發揚一個固有的哲學理論，來防禦歐美思潮的侵略。我們固然不可漠視現代進步的教育理論，但我們教育的使命，是要發揚五千年文化的民族精神。

「(二)我們要訓練青年獲得生產的，特別是農業生產的觀念與技能。學校應該離開都市，設於鄉村，學校的建築要適合農村的經濟狀況。至於現有的官廳堂皇的建築，却不妨改作博物院，美術館，音樂館，用它來保護和宣揚國家的文化。

「綜合起來說：我們要用民族固有的哲學，來培養公民自信和自尊精神。要用鄉土教育來訓練青年了解並運用他在所生存的環境。要用勞作教育來訓練青年獲得農業的生活觀念與生產技能。

最後我提出關於高等教育的問題，請求陳先生指教。

陳先生說：「一部份人認爲優秀學生應該學習自然科學，而劣等的學生却不妨向社會科學一試。這種觀念，誠令人百思莫解。社會科學如法科，原以訓練治人的人才爲目的，治人是要管理衆人之事，而是很困難的工作，這種工作當然不能讓劣等人才去擔任。所以此後要慎重的選擇優秀學生來學習社會科學，並應該嚴格予以管教。

理工教育方面：要根據環境的實際需要，來訓練適量的理工人才。此外應該在產業的所在地來建立理工教育機關，譬如：大冶設有鐵廠，我們應該於其附近設立探礦冶鐵的技術學校，此不僅要利用產業設備作爲實習，並使青年耳濡目染，覺得現在所學的，將來均須付諸實用。

「關於文哲方面：學校教育尚不能養成偉大的哲學家，政府應在風景幽雅之地，如武漢大學所在地之珞珈山等，搜集豐富之圖書，設立大規模的研究機關，使一般有志之士，自動鑽研。

附註：上面係陳先生談話的一部份的記錄，因爲時間匆促，沒有送請陳先生看過，就在此登載。如文意與陳先生原意有出入之處，應該由記者負責。

第二期目錄

勢矣富人哀此窮獨	吳稚暉
黨派問題的論爭(四篇)	武仙舟等
我們對於黨派問題的意見	陶百川
初期抗戰的經驗和教訓(三篇)	汪精衛等
蘇聯在「和」與「戰」	浦衛等
捷克作家預言太平洋的爭奪	姚蘇風
一個外國人在虹口火線中的日記	張常譯
逃出南京難民區	更生

了。事實上日本人的確已經在騷擾，並且在奇怪：何以中國人會這樣的愚笨，在這種狀況之下，還不投降求和，而向「永不敗北」的皇軍作無謂的抵抗？而那邊分宣傳的日本空軍的威力，直叫日本的一般平民深信：日本空軍是世界無敵的，任何一國的防禦工程決不能抵禦日本空軍的轟炸，甚至英國在香港和星加坡等處所建築的炮位軍港，也都是「無用」的；因爲這一類的建築據說都擋不住日本的「鷹」的空襲。

日本的報紙既然大吹特吹「皇軍的勝利」，那當然沒有什麼奇怪，在報上居然討論到「和平」的條件。一張有相當勢力的日報上就堅決地提議：和平條件中必有四十五萬萬日金或二萬六千二百五十萬英鎊(倘若戰事延長，這個數字勢必隨之增加)的實際戰費的賠款，外加陣亡將士家屬的恤金，日本在華投資的償還。進言之，中國土地之某一部份必須劃歸日本管轄，以爲「不誠於日支合作」的「階級」。這「誠」字是何解釋的呢？日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這是「謙虛而服從」。

雖然，除了一小部份外，全國人都是擁護他們的政府和陸海軍的。而所以能使全國有這樣的心態的原因，則由於一種恐懼心——共產主義的恐怖。日本政府的宣傳足以使一般人民深信，中國已經是一點宣傳上，固然可以說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是在宣傳的價值以外，那我們就覺得這一種恐怖是無謂的，而且是毫無根據的了。

日本的大多數人民，並不視中國爲他們的對手

再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王芸生

我的「試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一文發表後，接到張宗植君的來函，這封信裏所提出來的問題，與我向來對於國家問題認識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悲觀的氣分比較重了些。我以為我們對國事只應加深認識，痛切自責，而不應悲觀。假使我們還有堅固的自信，相信我們的民族國家還要繼續生存下去，則生存途中的一切困難都可由我們已身的力量把牠們克服了。目前的情形，正是我們在生存途中遭遇了困難，我們要一面反省過去的錯誤，同時奮力衝破目前的困難，繼續走向生存的大路。我們萬萬不能悲觀，悲觀將使我們失去生存的定力，走上幻滅的悲境。

你責備一般輿論的「迷信」「輕敵」與「瘋狂」，是很對的。我也是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在浮薄淺薄的呼號裏，我自然也要直接間接的分負一部分責任，因此我願意首先接受你的責備。

在你的信裏，充滿了自責自省的情緒，這是絕對正確的，也正是我向國人一再呼籲的。關於這一部分，我們的觀點完全一致，不必我再來重加說。不過，我希望你儘量加重主觀的自責，但同時也莫太輕視了客觀的估量。我對國家前途之所以不完全悲觀，就因為除了主觀的自責以期煥發自力以外，同時也還較冷靜的從客觀方面去觀察敵人及世界。我常說：「從客觀方面去觀察敵人及世界，一切皆與我們有利，所成爲問題的只在於我們的主觀力量如何？」這話是自責自省，但同時不因自責自責而泯沒了客觀的條件。當然，我們先要有充實的

主觀力量，然後纔能運用客觀的有利條件。這是不待言的。在這裏，我願意特別談些客觀的觀察。

日本的內部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一般人把日本估量得太低，因而發生一種「抗戰必勝」的迷信，那是危險的。但日本本身的缺點是客觀的存在着。我們當然不能「杜撰日本財政的崩潰」，但日本財政經濟的困難則係事實。這一點，我想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方式一併來談。你說：「帝國主義的向外殖殖是否危害本身，我們可以找到英國爲例。」這的確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英國帝國主義的發展，在初期是由軍事征服的方式，然後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高度化。英國過去的軌跡，好像就是現在日本的路線；但因空間時間的不同，其結果便將大相異了。英國進行軍事征服的時期，在時間上，尙是資本主義的萌芽期，而且英國本身便是資本主義最前進的一個，同時少有能與他比肩的。在空間上，他征服的是文化懸殊的落後民族，如印度等。現在的日本帝國主義，尙未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在並世帝國主義羣中尙有許多高峯，他本身既未健全，一面要與旁人競爭，同時在經濟上更要仰賴旁人，這是時間上的不同。在空間上，日本所要征服的對像是整個的中國。即使撇開遠東的國際關係不論，從中日兩國的本身講，縱使我們現代化的程度不及日本，而文化的比例也不是當時的英國與印度。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的缺陷，我在一篇關於「中日戰爭的前瞻」的文章中會有一些討論，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矛盾及其經濟財政的缺陷，

而認蘇聯是他們的主要的仇敵。他們都認定：將來對蘇聯作戰是不能避免的。目下在日本島的極北部已駐有十萬的兵力，以作準備。誰也相信：軍部已把最精銳部隊派到滿洲去，而且選把最優秀的軍隊留起來，凡二十歲或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現在多還沒有被徵發。有許多日本人對此頗爲驚異。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大學教授對我說：「一般跟我相仿年齡的朋友多出動了，而比我年青的都還在社會上服務。我們是很相信，我們的政府是準備着對俄作戰呢！」

日本的民族對於共產主義的惡感甚深，這就非研究日本的歷史背景不可。沒有「天皇」就沒有日本，至少限度，沒有天皇就不能有繁榮的日本，一般的平民有着這樣的盲目的信仰。而天皇與共產主義當然是永不相容的東西。日本，到了現在，還沒有澈底忘記一九三六年二月的「暴動」事件，甚至於有許多人還恐怖着這樣的暴動會在一九三八年或一九三九年再起來。將有一次暴動是成功的吧？而且，那一次暴動的原動力將不是右派的示威，而是左派的革命吧？

我會經跟人家談起：中日戰爭延長下去，日本將有革命的可能，因爲日本的經濟機構是日趨於崩潰了。雖然祇有極少數的人同意我這念頭；但是，一般人所提出的反證終不能叫我屈服於他們的論證。所以，我們相信：將要有一次革命在日本爆發，問題只是遲些或者早些而已。

都是很客觀的事實，這的經濟生命操在旁人手裏，在長期爭中必將發生破綻。至於國內的反戰心理，確是相當的普遍，這在日本俘虜及兵士屍身上所發現的往來信函中，可以看出。不過，日本社會的組織嚴密，人民的國家觀念強固，尚能維持。但在長期的苦戰中，或對外受打擊時，這種反戰心理，能強化並形成一種力量。

我近來因爲思索國家問題，在思索我們的建國前途的路線時，發現近代日本的形成，有許多地方是與我們相同的。日本是一個十足封建的國家，自神武天皇藤原氏始盛時起（西元七二四）直至現代，這一千多年間，一直受着軍閥的統治。軍閥則是大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明治維新，原應是新興的民衆階級的革命，結果這個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妥協了。所謂王政復古，徹底形成了藩閥政治；而明治維新便是新興民族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的聯合政權。這兩個階級聯合在一起剝削壓榨生產的農民。日本政治的腐化、經濟的矛盾，都發生於這個根源上。中國的統治，也一向操在大地主階級手裏，近年的革命運動，也很與日本維新時的進路相同。不過因爲我們的工業基礎更差，因此政治表層的腐化，經濟組織的薄弱，也都較日本爲甚。近年因爲日本的軍事侵略，減少了我們內部的矛盾，加強了國家統一的運行。中國與日本這兩個國家的形態，都在急劇演變中。中國因受國難的洗練，國內政治是在向着進步的方向紛變中。日本則走着反動的路，軍閥地主正在加緊向工業資產階級反攻。日本的所謂法西斯政治一旦實現，那便是地主

階級宣告復辟，日本的政治重新回到幕府時代。日本的政治，是在逆流着，我們若能抵得住「的向外衝，或長期對立的把」拖住，日本這個國家將會發生根本問題的。我們的弱點是現代文化不夠，工業基礎太差。我們要建國，要抵抗日本，最根本的是徹底接受現代的科學文化，加緊國家的工業化。

談到國際關係，我們絕不是孤立的，一般人的迷信和倚賴，那是最沒出息的想頭。在八一三抗戰以前，我曾親耳聽見一位國際問題專家的宏論。據他說，我們只要一抗戰，蘇聯必動，英美必來。把蘇聯的陸軍，英美的海軍，都算到自己的帳簿上，實是最糟糕的想頭。這種人當初對國際的看法最有把握，現在便也最失望。其實，這半年來國際變化甚大，並且還在繼續變化。這一切變化都與我們有利，都是針對着日本的狂暴而來的。太平洋上的急勢軍備，尤其英美聯合局勢的實現，這都不是半年以前所能想像的。日本軍閥爲什麼不深入西北？爲什麼不積極南進？陸上的大熊，海上的雙虎，究竟是值得顧慮的。只要我們能撐持得住，在日本軍閥狂極力疲時，國際變化是會加急到來的。這問題較爲精微，有機會我當再具體的談一談。總之，我們對於國際不可稍存微倖心理，在自己的算盤上，要獨力來負擔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但對於國際環境，亦不能漠視，它究竟還是我們對日決勝的一個因素。實際上，這半年來我們在精神及物質上已得到很多的國際援助。更具體的援助的取得，主要的，還得我們在軍事上能支持一個像樣的局面。

我說「中日問題的根柢在於文化」，是曾經過

深思熟慮的。我所說的文化，不是博物院考據室裏的死文化，而是能建國富民的現代活文化。我們比較缺乏這種文化，所以比較貧弱；日本比較學會了這些這種文化，所以比較富強。我們的建國問題，看表面，萬緒千頭，究根本，只是一個文化問題。最根本的是徹底接受現代的科學文化，加緊國家的工業化。你問我：「建設（其實是建國）到底將遵循何種途徑呢？如果有了了一定的途徑，是否那途徑可以確保統一而且加強統制全國的中心勢力呢？」現代國家的建設，所謂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只是名詞與方式的不同，內容完全是一個，便是儘量發揮科學文化，完成國家的工業化。這話也許太籠統，但都是不折不扣的道理。這是建設現代國家的唯一途徑。循着這個途徑前進，經濟，政治，軍事，國防，一切一切皆將次第建設起來。迄現在止，我所提出的建國論，尚只是一個原則。至於理論思想上問題，我預備將來具體討論，現在可不細談。

中日問題，是一個長期問題。你說，「我們應該深深的體驗長期這兩個字」。我完全同意。當大公報滬版停刊時，我寫過一篇「暫別上海讀者」，其中有一節說：「中日兩大民族的競爭，好比一個無盡的接力賽跑，我們這輩人正捧着競走的火炬，我們要守住這民族火炬，努力向前，等到我們這一輩人力盡了，再把這火炬交給我們的子孫，繼續向前，奔下去，奔下去，一直奔過我們的競走者，而仍向前奔。中華民族的火炬永不熄滅，中華子孫永不歇脚！」目前的困難，是我們過去自不長進的結果，現在惟有咬牙使勁，打開目前的困難，走上競走的長途！我們只有努力，萬萬不能悲觀。假使我們悲觀了，人家將跑得更遠，中華民族便永久落伍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漢口）

眼前的國際局勢

記者

一 許大使下旗歸國

許世英大使業於二十日離東京，就歸國之途。這是東京政府強暴宣言的結果。它既聲明「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實際即是宣佈斷絕邦交，則我們中華民國的駐日大使自然要下旗歸國。

四十四年前汪公使（鳳藻）下旗歸國時，兩國正式宣戰。那末事，在法律上雖然是正式戰爭，實際上則是日本全國與中國的北洋一隅戰，甚至與李鴻章一個人戰。現在的兩國戰事，在國際法上雖然尚未成爲正式戰爭，而實際上業已構成真正的民族戰爭。這次戰爭，中國在一個統一的號令之下，動員全國的軍隊，發動全國的力量，從事對外戰爭。這在中國民族史上是空前的，在中日關係史上更與甲午之戰不同。現在是整個的中國與日本戰，全體中國人與日本軍閥戰。甲午戰爭時，日本戰勝了北洋一隅，戰勝了李鴻章一個人，便可得利確定的勝利；現在情形大大不同了，現在日本軍閥必須占盡了中國所有的領土，征服了中國所有的人民，纔算得到確定的勝利；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大公報）

二 敵已示弱

日本現在真是宜戰也難，不宜戰也難。在此進退維谷之中，祇好請求德國向中國提出所謂媾和條件，據廣田宣佈的內容，共計四條：（一）中國政府須放棄聯共以抵抗日本及「滿洲國」之政策，而與日「滿」合作形成對抗共黨之壁壘；（二）在若

干地帶成立非戰區域，並在非戰區內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中國對日賠款。這中間包含承認「滿洲國」及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條款，自非中國所能承認。敵人於是利用所謂「不能以國際法解釋」的無賴手段，一面宣告不以國民政府爲外交的對手，一面製造傀儡組織。這是敵人能以武力征服中國的說明。

廣田最近又花言巧語，如所謂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維持中國門戶開放，這完全是對英對美的獻媚。列強應記取半個月以前，寇還在大聲要驅逐白人退出遠東，今日的語意溫和，態度馴順，正是中國長期抗戰的結果，列強軍事準備的效力，今日倘聽寇調言，那就中寇詭計，若深信援助中國已經奏效的對日抗戰，可立措世界於和平，則趁此日寇示弱之時，予以一擊，必可事半功倍。（龍章）

三 日寇竭澤而漁

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舉世周知。此次傾其全國之力，大舉侵犯我國，關於財政方面，早知其必有「竭澤而漁」之一日。所以自客歲贛粵兩省變以來，敵人即盡量搜括民財，濫發赤字公債，照議會通過的特別軍費廿五萬九千二百萬，預計到明年三月，至少還差四十萬萬，人民已經負擔不了，現在大藏省又決增稅三十種，想來彌補這龐大的支出。

照這樣的加重人民負擔，來替日本軍閥所建造升官發財的基礎，人民內心之怨恨是可以想見的。我們且看日本產業聯盟會長總誠之助男爵，日前所

發表的談話：「日軍作戰之軍費數目，現亦無從預計，一切惟有待諸將來事件之發展，始可明瞭。惟不論結果如何，日軍所耗者必巨。政府除發行公債以求彌補外，別無他法。關於增稅事，各方言論，每不相同，有主張增高稅率者。惟此亦須詳爲考慮後，始可施行。按現時日本法律規定，納稅最多者爲富戶與各企業團體，彼等所納之稅，已較前增二倍或三倍，至於私人之收入，亦須納極高之賦稅。現時之稅率已經太高，實有減低之必要。」（龍章）

四 法新閣之將來

法國的開潮，本爲歐洲以及世界政治之一特殊風景。在最近開潮以後，於波瀾起伏之餘，終以鳩當再組新閣而暫告一結束。這鳩當內閣當然與舊鳩當內閣不同，首先這新鳩當內閣中沒有社會黨的黨員，而幾乎純粹是一急進社會黨的內閣。

因中央派要求抑壓共產黨的力量，而布魯維依然實於社共合作，所以鳩當只有亦只能組織一急進社會黨的內閣。但社會黨雖未入閣，仍決定贊助，而共產黨本來未參加第一次人民陣線政府，對於鳩當政府態度雖作保留，仍宣布「合作」。所以法國新政府之成立，還不能認爲是人民陣線政府之減。

但是，急進社會黨在國內左右對立之局中，壽命難於長久，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新鳩當內閣是一個過渡內閣，是可以預言的第一點。法國人民陣線之將來，將視急進社會黨的態度而定。急進社會黨還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呢？這自然要看法國國內政治力量之對比及改編而定，同時也要看國際形勢而定。不過照法國內外部的情形看來，向有

失地的政治工作

王健民

自東，西，北各戰場失利後，敵人對於我國領土，由點的佔據，進而為線的佔據，復因線的平行作用或環繞作用，而形成面的佔據。因此，敵人於佔據張家口，歸綏，保定，太原，鎮江，杭州，濟南後，就揚揚自得，以為對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江蘇，浙江，山東等全省已宣告佔領，並在他們的國內，大開慶祝會，以自欺欺人。但是他們佔領我們某一個省會，不能視為即佔領了全省，正是和佔領我們南京，不能視為有滅亡了中國一樣。按之實際，上列各省，除了幾個點和幾條線之外，其大部面積，不但依然有我們的重兵駐紮和游擊，即各縣政權，亦仍然在我地方官吏掌握之中。我們也承認：有許多不肖官吏，聞警先逃，擅離職守，致敵人對於該地全面之佔領，易如拾芥，或無恥漢奸，乘機策動傀儡組織，以為賣國求榮之計，此固為人的問題，但我們至今未能確定失地政治工作之要點，俾地方官吏得盡守，也不能不視為缺憾！

首都失守後，蔣委員長會電令各級政府：其一省會不守，應遷於該省之他縣繼續工作，某一縣城不守，應遷於該縣之鄉鎮繼續工作，地方行政專員亦復如是。這是失地政治工作的基本綱領，我們應從各種綱領，定出一個詳明的方案。

我們對於失地的政治工作，願先提出下列幾個問題，以供讀者的探討：

一，人選問題：我們對於縣長人選，絕對反對老氣橫秋，只知升官發財不知國家民族利益為何物

的腐敗官僚。不僅在失地如此。我們主張打破平時資產的限制，拔用熱忱愛國忠勇奮發有為的青年，担任縣長及地方政府的職員。各省政府，應當設立縣政人員訓練班，招收中等學校以上身體健康，學識豐富，思想正確的青年，予以三個月以上嚴格軍事，政治的訓練，使他們担任地方政府幹部的職務。對於等因奉此的公事形式上不必過於吹求，而對於戰時的政治工作要點，要切實的求其執行。尤其重要的，要他們與當地的民衆打成一片，共同負起救亡的責任。

二，地點問題：我們主張應該切實遵照蔣委員長的指示，只准遷移，不准放棄。即令某一政治區域全部失守，亦當採取兩種方法執行職務：第一，把政府機關秘密起來，第二，遷入鄰境，設立辦事處，依然聯絡政治的機構，如保甲組織等，照舊執行職務。至於政治的形式，應組織地方聯合會，機巧地執行政府的法令，而與敵人和漢奸堅決鬥爭。現在失地各個維持會的組織，不盡是漢奸們拿來作為逢迎敵人的見面禮。假使我們觀察形勢，着手優先，或對民間組織，能相繼予以運用，我相信不但敵人不能充分利用，更依然可以視為抗戰的力量。

三，工作問題：失地的政治工作，以適合戰爭的要求為第一義，我們以為應該注重下列幾點：
甲，健全保甲組織：保甲組織的法令，本身極

轉的成分恐怕較多，而這樣恐怕又難免引起社會黨的分化。這是我們可以預言的第二點。但是，無論如何，法國外交政策決不會有所變更。這不僅由爾博斯連任三次內閣的外長可以看出，而目前國際形勢也不容許有所變更。換言之，法蘇關係不會因內閣之變更而受影響。即令將來急進社會黨與中央諸黨合組內閣，法國外交也不會受大的影響。這是可以預言的第三點。（時代）

為精密，惟軍委會初制定保甲制度的意義為肅清土匪，我們現在應進一步以訓練人民保衛祖國為其積極的作用，以肅清漢奸及間諜為其消極作用。健全保甲組織的基本方法為選用忠勇的知識的青年及愛國紳商為保甲的幹部人員，一掃去當地無業流氓充任，或實際上人員多付缺如的殘廢狀況。如保甲組織健全，即令全境淪於敵手，亦可隨時運用，為國效力。

乙，厲行軍事訓練：過去的國民軍訓，以定期的訓練完畢為止，並未賦以任務，以致戰時不能收為國效力之實效。失地的軍事訓練，應做到：（一）供戰鬥員之補充，（二）自衛隊，游擊隊，偵察隊……之成立，活動。其最高的目的，要能與敵人拚命作戰。

丙，堅壁清野之實施：一切物品，舉凡足以資敵者，儘量加以遷移或燬滅。近來厲行倉儲制度，因農產豐富，各地的糧食的存儲不少，此等糧食，如不加以遷移，則敵人一到，即可作為糧餉。東戰場之米糧，西和北戰場之麥麵，如能及時遷移，必可使敵人發生糧食恐慌，而予以軍事上的打擊。此

關於民主政治之論爭

本社特輯

在抗戰前曾有一個專門從事民主運動的刊物。抗戰發生，這個刊物就停止了。但在幾個月之後，又出現了民主底呼聲。在西安，叫得很響亮。其次為漢口。此外的地方亦有不少的應聲。民主於是成爲抗戰中的一個問題。

主張民主的人，以爲抗戰需要民主。理由是：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救國公債的難銷，農村之未援助抗戰，人民之未熱烈助戰等「缺陷」，都由於「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的緣故；所以要獲得勝利，必須實行民主；只有民主的政府纔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於是他們主張「民主抗戰」，反對「獨裁抗戰」。

這些主張民主的理由，依我看來，並不是爲着抗戰。假如真是爲着抗戰，那就沒有一個能够成立。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是華北未被中央統一的結果。這在「抗戰底根本問題」一書上有詳明的分析。救國公債底難銷，一方面由於宣傳工作不够，一方面由於逃難者多，有好些錢變成逃難費用去了。農村之未援助抗戰和人民之未熱烈助戰，乃過去民衆運動底缺點使然。在教育未普及以至文盲很多不能閱報讀書的情形下，加以前述缺點，民衆根本沒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意識。如果有之，像救護傷兵，捐

輸財物，協助軍隊一類事，雖專制政府亦不會阻止。但像自動武裝起來一類事，那就是民主政府亦不能准許。世界上曾有一個民主政府給與民衆以自動武裝之自由的嗎？而抗戰對於民衆所需要的軍事上的參加，是組織的方式，如所謂徵兵制度者，絕非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的自動武裝起來，自動參加抗戰。至於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方法，不限於民主。俄國之參加歐戰，不是用沙皇專制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意國之征服阿比西尼亞，不是用法西斯獨裁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日本這次侵略我們，是動員了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然而主張民主抗戰的人把它底政府詆爲法西斯軍閥獨裁，不又是見法西斯軍閥獨裁的方法亦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嗎？所以抗戰需要民主之說不是確論。把過去幾個月抗戰的缺陷歸因於不民主，更是錯誤。意國與阿比西尼亞作戰的勝利，難道是它行了民主政治的緣故嗎？勝利與民主沒有必然性的關係。

老實說，站在抗戰需要上，當前的政治問題，從中國的情形看來，應以鞏固中央政權爲急務。很明顯的，抗戰所最需要的軍隊，政府還沒有完全統一的軍政軍令的能力。有些省區政府底命令不能到達或完全到達。這在作戰上和動員上妨害很大。華北軍事上的失利，不就是軍政軍令沒有統一的结果嗎？所以完成統一之關係於抗戰比實行民主緊要得多。敵將松岡孝良所嘲罵的這句話：「中國實力派

外如燃料，交通工具，以及其他足資敵用之金銀物品，農產品等，能遷移者遷移之，不能遷移者，除留守居民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外，概行燬滅。至於遷移方法，最好與當地駐軍協作，請其徵用或大規模運輸。

丁，流亡之撫卹及遣送戰區的流亡羣衆，應儘量予以救濟及遣送。有組織的課以軍役或工役。壯丁及智識青年，尤應設法保護，使其從事當地鬥爭或移地工作。老弱殘廢，安土重遷，勢難兼徙，亦應事先予以訓練，佈置要地，令其留守，以爲傳遞消息偵察敵情之用。

失地的政治工作，我們要切實做到民衆精神總動員，用種種宣傳方法，提高民衆的民衆意識和國家觀念，使他們的抗敵工作爲自覺的，自動的，堅定固執，不屈不撓。有了這種精神動員，則力量雖有時而窮，而精神一致。這是我們國家於萬劫後潛伏的偉大力量，我們要培植此種力量，以爲將來翻身之基礎。

我們始終認爲此次戰爭失利，一半由於軍事，一半由於政治，對於失地的軍事工作，本文暫不備論，對於政治工作，假如我們能根據上述的要點，予以實施，並與軍事的活動緊密聯絡，使敵人在我們的領土僅能佔據點和線，而不能佔據全面，縱令佔據某地面積，而不讓其起消化作用，並相繼予以打擊，我們相信是可以操最後勝利的左券的。

大部份採取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爲國爲民觀念」，——這正是對着我們不統一的情形而說的。我們應該趕快完成統一，使那些與政府對立的實力派，不單是正規軍方面就是游擊隊方面，亦

同樣嚴格接受命令，辦到政府對於軍官能夠自由調動，對於軍隊能夠自由編制，自由整理，自由調遣。所以完成統一，是抗戰底迫切需要。而完成統一，把中央集權強固了，對於民主就起部份的實現。民主以中央集權為制度，強固了中央政權，地方政權必然削弱，這還不是中央集權底實現嗎？抗戰時期所能實行的民主，只能做到這個境地。

確實，今天要求民主的人，在社會構成上，都是一些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他們不管現實，就在「事已急迫萬分」之時，亦要追逐幻想。從前希望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希望在與敵人作戰到十分激烈亦十分危險的時期實現民主政治。這真不愧是有階級！

並且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根本沒有科學的思想。所以不能認識中國實行民主的過程及中國民主底特質。假如有了，就可知道在中國爭取民主的是國民黨。它爲了完盡這個任務，曾與封建政治爭鬥多少年，到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把中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民主運動底歷史意義和偉大意義，在這個時代國民黨已經做過了。

你們現在的民主要求，乃是對國民黨要求。這裏，你們却懂得現有的政治並不是封建的，所以政權不在貴族手中或君主手中，而是在國民黨手中。國民黨不是貴族，乃是人民的政治團體，以代表全國人民自任的。他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為旗幟。而他之取得政權，是用革命手段從封建勢力方面奪過來的。俄國革命後由唯一的黨永遠掌握政權的事，更給以新的教訓。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是中國

民主在革命過程中的特殊形態。這是不可忽視的一點。至於國民黨之不像俄國革命後那樣實行選舉，可從孫中山先生底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中求得解答。那裏面包括有革命中的專政需要，中國底民族運動，人民底智識程度和辛亥後的選舉經驗種種。但國民黨是民主黨，所以有實行選舉的決心。若不是抗戰發生，國民會議已開，憲法已制，而且將從此時起逐漸走上憲政時期。

所以現在的民主要求是對國民黨要求，並沒有歷史的意義和偉大的意義。而對國民黨要求，乃是黨與黨爭取政權的意思。這不外說，國民黨一黨掌握政權，我們沒有份，應該分點給我們。這顯然是爲了黨派底利益。如果說不然，那就把一黨掌握政權看成不民主的進行。然而這何解於蘇聯今日底民主？蘇聯今日底民主，據說是很新的，但除開共產黨外不允許別黨存在，甚至同黨內的派也不能存在。因此，國民黨依它底辦法實施憲政，你不能說它不是民主。它既是民主，那末你之向它要求民主不是要求你自己底黨分得政權還是甚麼？

關於自由，也須說幾句。國民黨因爲沒有實施憲政，所以人民所享受的自由還不充分。但只能說是不充分，不能說沒有。而且我還可說，凡是順着由封建到資本這個階段走的人，都享有相當的自由。只有向着超於這個階段走，甚至採取打倒式的人，才沒有自由。然而不是完全沒有，一九二八年以來所出版的異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書報，並不算少。就是在去年以前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爲漢奸的刊物，依然能够出版。然而在很新的蘇聯民主下，則不

能這樣。足見國民黨所不給別黨的自由是暴動自由和謾罵自由。所以今天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黨是爲自己要求，並不是爲一般人要求。只有它纔需要暴動自由，謾罵自由，並且還需要保存一種軍隊的自由，保存一種區域的自由。

但是從中國底歷史階段看來，應以創造近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爲任務，簡言之，是創造一種國家制度的時代，負有這種任務的國民黨，當然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而在目前的抗戰時期，爲了集中力量鞏固後方起見，領導抗戰的國民黨，同樣而且更是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所以不論怎樣，中國此時所要求的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統一的政府，一個統一的軍隊。因此，不僅國民黨要反對別黨有謾罵自由，暴動自由，保存軍隊自由，保存區域自由；就是人民，也要反對別黨有謾罵自由，暴動自由，保存軍隊自由，保存區域自由。我們不應該讓任何黨以自由之名來分裂國家組織，分散抗戰力量。

一個黨爭取自由，不站在歷史底立場，人民底立場，而僅注意自己一派一系底利益，根本沒有價值。我說爭取自由者口中的自由，是派系底自由，不關於人民，他們必然不會心服。但事實却是這樣。要證明這點，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常常要求言論自由，但到他們一獲得了時，便不許別人享受。我只因爲發表了「長期抗戰論」等文，在籌集抗戰經費和分析國際情形上提出一點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他們便造謠誣害，說我是托派，匪徒，漢奸，並捏造證據，說我「在上海」與敵人領事館取

抗戰和民主的相關問題 韓伯言

近來在長沙的刊物上常常看到一個爭論的問題，就是戰時是不是容許民權自由的問題。兩三星期以前，長沙力報上，「星期論文」欄登載過呂振羽對伯贊的兩篇文章，都談到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在抗戰中的運用。同時做七札週刊和將前十日刊則針鋒相對的主張戰時的獨裁。其後市民日報復刊，有澄英的一篇雜感，竟把這兩種主張的對立強調起來，加以「國家路線」和「民主路線」的名稱，並且說後者是「蔣呂路線」，是向政府要自由即向政府算舊帳的路線。全民日報副刊接下來發表廖伯華的一

篇駁論，認定澄英是存心挑撥，企圖分裂民族統一陣綫，其實這兩種路線完全是澄英杜撰的，而蔣呂的個人意見，也不能代表一種路線。最近做七札第七號有宋之偉的一篇戰時自由平議，據作者說是他和劉曉桑呂振羽譚丕模向培良黃芝崗諸先生，就「統制」和「自由」的辯論開誠商

量，作了一個結論，即：「目前需要集權而終極不歸集權民主；終極需要民主，而目前則不能不歸重集權」；於是他再寫一篇平議以申述前述結論的涵義。而前兩十日刊仍然在「前哨的尖兵」裏面說：「有人主張民主，提出了開放政權的要求；有人擁護集權，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權的分裂。這無疑是民族統一戰綫上的一個障礙，這障礙近來有擴大的趨勢，在原則上，我們贊同後者反對前者。戰時的國

家組織，就如同一個軍隊，軍隊裏面，只有命令，沒有民主；只有絕對服從，沒有意見的紛歧」。又說：「因為民族國家高於一切，所以只有民族的意識，國家的權威，要使民族意識得以發揚，國家權威得以行使，便只有集權的獨裁。民族解放的鬥爭未成功，不要喊民主」。

這種爭論是不是就在這裏可以停止，是不能斷定的。我們就反民主論者的論點來看，他們已經不說「民主是沒落的制度」了，他們也承認「終極需要民主」，承認「民族解放鬥爭，成功以後要喊民主」了，不過他們所堅持的是「戰時不能有民主，戰時只有集權的獨裁」。

很顯明的，他們的誤解之一，是把民主和集權機械的對立了，而把集權和獨裁又看做同一物了。其實民主和集權是不能分開的。我國自對日抗戰以來，國內已經是空前的統一，中央政令的效力，從來沒有這樣普遍這樣有力的，這較之從前是集權多了，但這種集權却是由民主得來的，因為中央已經容許各黨各派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抗日（蔣委員長談話大意如此），於是共產黨取消暴動政策，紅軍改編為國軍，中華民族解放同盟自動解散，這都是民主和集權並進的事實。就目前中國情形看來，如果政治更民主化，則同時集權的程度必定可更增加，因為任何人有機會貢獻其意見和能力於中央，中央的行動能反映任何人的意見於融一體之後，運用任何人的能力於統一指揮之中，他決不會找

得聯系，共同商榷，領取津貼，出版反共的破壞統一戰的刊物，請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處決漢奸敵探之軍法嚴厲地處治」。編者按：羣衆週刊第四期漢夫先生會對葉青先生如此攻擊。這不是他們底黨口中的言論自由只是他們底言論自由的證明嗎？老實說，他們底黨還沒有在朝，便這樣地不許人家說異於他們所說的話，那末在朝後除開他們有言論自由外，誰還能有的呢？這一切，便是他們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真意。說抗戰需要民主，乃是一種口實。而且那也不過因為在抗戰要求民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罷了。（節自掃蕩報）

的出陣，而不依從國家最高機關的指揮。相反的方面是越獨裁越分裂，因為中國還沒有失去割據稱

確的可能性，假使有一部分力量不能包括到集權政府裏面去，則這部分力量又不免恢復他的割據。這種道理，實在是很粗淺的，可惜有成見的人從來不肯去思索。

如果談民主的，離開集權而談民主，那是應該受批判的，因為無集權的民主，只是散漫分裂紛歧！同樣，如果談民主的，離開抗戰而談民主，爲民主而民主，那也顯然是錯誤的，因為那是把「抗戰第一」的原則取消，而有加深對內摩擦的危險。

可是，在反民主論者看來，抗戰和民主正是應當分開的，目前抗戰第一，根本就不需要民主，民主政治要等抗戰成功再說，這是不對的呢？一般人對於反民主論者的錯誤最不容易看出的就是這一點。因為他們可以拿世界大戰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情形來做例子，甚至拿目前蘇聯政治獨裁化的情形來做模範，用事實證明戰時必須獨裁，必不要民主。

國軍戰時政治化

現今我們國家的政制，在法律上是國民黨的黨治，在一般的政治上，則要求黨治的民主化。這種制度與情緒並不絕對衝突，是可以共進而合流的。但在對日抗戰的國家現況下，黨治已嫌不夠，民主亦遷延遠，主要的是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

現在我們國家的政策是抗戰第一，國家的利益是軍事高於一切。在目前以至於三五年內的階段上，是我們從事民族解放戰爭的時期，一切一切，皆要以軍事利益為第一目標，凡有利於軍事的都要併力進行，凡較緩於軍事利益的皆可緩漸進行。由國務院到政府，都運用軍事部，一切要建設在軍事利益之上而軍治化。

近代的國家，一遇國際戰爭，平常的政府機構馬上改造，成爲一個有力的戰時政府，一切法律政令皆集中於最高總司令部的指揮之下。我們對外抗戰業已半年，只看見政府機關的顛沛流離，不見有一個強力的戰時政府出現，甚至在制度上還在爭論着黨治或民主的問題。這現象，縱使不是我們的政治能力薄弱，也有若干精神是浪費了。

國民黨的黨治已實行了十幾年，在平時的政治缺陷可憐而不談，在這半年來的抗戰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弱點，還不够說明這個黨治的不健全嗎？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的要求民主，還在抗戰以前是應該的，到現在還可以從事實技術上去求逐漸實現，但若用這個口號發動戰爭，因而發生政治上的變

，那便很嚴重的違反國家利益了。我們是主張民主的，但在今日，爲抗戰的利益計，則須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全國團結成爲一個個體，在我們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後，國家政治自然民主化了。

目前的事實，便是說明這種趨勢。西安事變以後，國民黨的門戶業已加寬；抗戰發動以來，黨治的形態正在刻刻蛻變之中。這蛻變的趨向，很明顯的是在逐漸的民主化，這蛻變必將隨抗戰的進展而加劇前進。各黨各派在這時要共同支持國家的政治中心，團結抗戰，不必呼號民主，國家的政治的動態自然趨於民主化。這在理論與事實上，均是如此。在這時談黨治與談民主，在談者雖各有其立場及理由，其實談之無益，不談則反可順政治的蛻變而合流。大勢如此，何須爭論？最要緊的是大家共同著眼於抗戰的利益，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充實大本營的組織，舉凡政治軍事，一切歸其統率，一切聽其指揮，而一切統治指揮皆以軍事的利益爲依歸。在民治成熟的國家，到戰時國會且停止活動，一切授權於戰時政府，我們在這時還不應該使國家軍治化嗎？

在對日抗戰的國家的現況下，黨治已嫌不夠，民主亦遷延遠，主要的是加強國家在戰時的軍治化。國家在戰時，軍事利益高於一切，我們國家的政治需要軍治化！（大公報）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戰時獨裁是不是到處都是必要的呢？不憐君有一句精到的話說：「只有封建時代諸侯的征伐戰或軍閥的爭奪戰和資本主義者的侵略戰才是獨裁的民主的戰爭」。爲什麼如此呢？因爲那些戰爭都是違反民衆利益，違反民衆意志的，所以不讓民衆參加政治意見，勝敗存亡，由少數人負責並且用各種方法去欺騙民衆，壓迫民衆。我們現在的抗戰完全是另一性質的，它是代表民衆利益，符合民衆意志的民族解放戰爭，所以抗戰的命令一下，而近十年來的沉悶抑鬱，紛歧，散漫的種種力量，自動集合在統一抗日的大旗下面，整齊化強固化起來，和本戰時的政治高壓力加強；一切由軍部包辦的情形，恰好是相反的。因爲中國決不怕民衆起來會破壞抗戰的國策，相反的，抗戰國策只有因爲多數民衆自覺的擁護而更加強固。現在我們所着急的只是政府雖然要民衆參加抗戰的組織和訓練，而民衆因爲抑壓多年，不能放胆參加，雖在國難危急的時候，還存着消極的態度。對於這樣的民衆，如果忍心拿獨裁來恐嚇他，限制他，那就根本不要談到民衆組織和訓練了。

一般人又容易混淆政治軍事和經濟，其實這三方面的作用並不完全相同。我們的軍事需要指揮統一，我們的戰時經濟需要計劃，而我們的戰時政治需要民主的集權。我們要推進民主，同時也要推進集權。（節自新學識第五期）

反映民意與抗戰前途

近日我國論壇上對於民主政治似乎有了多少的波動，反對民主政治的人們，似乎有一個共同的見解，以為民主與抗戰是不相容的，這一點的確很值得我們的注意。我們全國當前的最大任務，是用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如果民主與抗戰不相容，那我們對於民主當然祇得割愛，那是無容疑義的。但是民主是否與抗戰不相容，却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有些人談起民主兩個字，就很自然地聯想到英美等國民主制度的國家，聯想到他們的議會，聯想到他們的選舉。中國在這樣的抗戰的緊急時期，沒有寬裕的工夫來設立以普選為原則的議會，這道是大家所看到的事實。記者以為目前所需要的民主，並非要抄襲英美等國的通常文章，也不是主張要在這樣緊急的時期選舉來建立議會。我們以為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民主，其唯一的動機，是要盡量發揮民衆力量，在政府及領袖領導之下，在種種方面參加抗戰，爭取民族解放自由。中國抗戰至今，在實際上只動員了軍事的力量，全國民衆的民衆力量，還未盡量發動起來，以至在前線苦戰的將領、亦痛定思痛、歎息於前方只見漢奸而不見民衆。我們對於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民主的理解，以為亦不過盡量發揮民衆的力量，以擁護抗戰，參加抗戰，以發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已。這話說來，民主不但與抗戰不相容，而且是要增加抗戰的力量。

至於民主的內容，依管見所及，認為必須包括下列幾點：

(一) 在現有的政治機構中應有反映民意的機關。這機關的組織方法，可由政府根據實際可用的辦法，用簡單而迅速的手續，成立起來，最重要的一點是這裏所容納的份子，須能代表全國各方面對於國事的意見，反映大多數民衆的意志，以備政府的採擇。

(二) 關於抗日及善後批評政治的言論自由。中國在現階段內，抗日高於一切，言論自由，亦應以抗日為範圍；凡有裨於抗日的言論，當許其自由；凡有礙於抗日的言論，絕對不許其自由。關於政治問題，因政治的清明革新，與抗日的勝利息息相關，故人民在言論上對於政治問題，作善意的批評或建議，亦應得到言論自由。當然，這種善意的批評與建議亦應以與抗日有利為前提。

(三) 組織抗日團體的自由。民衆對於抗日者政府的贊助，對於抗日工作的參加，都有組織團體的必要，但是這種組織，必須在政府領導之下進行。

最後還有一層意思附帶提出的，是祇有日本帝國主義恐懼民主；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用麻醉及強迫手段，勉強日本國民擁護他們侵略中國，在實際上日本民衆厭惡戰爭，反感心理是隨時潛伏着的，如採用民主，那末民衆抬頭，侵略戰爭便無法進行了。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也怕中國採用民主，因為這樣一來，中國發動民衆的抗戰，他們的侵略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在爭取民族解放而抗戰的中國，這形勢却大大的不同，因為全國人民都以赤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盡量反映民意，結果祇是增強政府抗戰的力量，也就是增強全國抗戰的力量。(抗戰第三十七期)

韓案面面觀

申報

韓復榘自主魯以來，偽為清廉，實極貪污。大權獨攬，奴使一切。中央為謀統一，曲予寬宥。乃韓於舉國抗戰之日，不努力效勞，始則力足以獨當一面，欺騙中央。繼則以保存實力為惟一目的，敵未來而先退。魯省本多天險，倘能奮勇戰，則泰兗之間，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作不謂將無鬥志，軍乃解體，望風潰退，日幾數百里。苟非中央設法補救，則魯省戰局尙可問哉？韓本為封建餘孽，依違時會，得膺今職。魯省戰局與抗戰前途，有極大關係。設韓能堅苦抗戰，則濟南縱未必可保，而泰安一帶，終有一場血戰。敵雖利用科學武器，亦未必即能破我天險。縱使猛烈進攻，亦必有極大犧牲。不幸韓不顧職，致千里險要，被敵長驅深入，為時不過數日，此而可恕，則不必言抗戰矣。

大公報

韓復榘革職拘訊的消息，業已發表。這是整肅軍紀的一件大事。

一個封疆大吏，當國家對外作戰之時，擅棄疆土，苛擾人民，當然不容於國法。

韓氏有罪，國家應予懲戒，其他軍政人員犯同樣過錯的，也要一律予以懲戒。

退出上海以後的南北各線戰事的失利，不全是軍力的問題，軍紀問題實占主要的成分。韓案應是整肅軍紀的起點，望全國將領以此為戒，保愛中華

國防前線之外蒙古

李慶錫

近來關於外蒙出兵之說，甚囂塵上，因而引起國人對於外蒙之注意。而且外蒙到底是中國的領土，中國的宗主權，即蘇聯和外蒙本身，也沒有否認過，所以我們對外蒙與蘇聯之關係及外蒙之政治經濟文化等情形，認爲有介紹於讀者之必要。

共和國成立之經過

外蒙古人口約有九十萬，面積計一百五十五萬平方公里，它位於中亞的北部，北與蘇聯毗連，西部，東部和南部，與新疆，甯夏，綏遠和察哈爾相連。

長期在封建和神權制度統治下的外蒙，自俄國革命後，就騷動起來，這種騷動，無疑的是有俄國做背景的。原來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之間，蒙古內戰頻仍，擾攘不堪，日本想利用這個混亂的機會，加強它在庫倫的勢力，所以極力援助白俄領袖謝米諾夫和名震一時的安惹。但是安惹雖於一九二一年佔領庫倫，王公與喇嘛雖曾接受以佛教僧侶呼圖克圖爲最高領袖組織政府，而立刻有個「民族革命」黨組織成功了。該黨領袖是從農民階級出身，他們有一行動的政綱，要旨是打倒封建制度，把地組織起來，與安惹對抗，因而討伐安惹，王公與喇嘛助自。一九二〇年就在莫斯科開始談判，一九二一年四月間，蘇聯紅軍繼續把日人白俄驅逐出境。外蒙的革命黨雖然勝利，並沒有立刻把攝政權

，呼圖克圖的王位仍然維持，不過他的權威加了大的限制，於是蒙古就變成君主立憲政體。一九二四年五月呼圖克圖死了，十一月間就召集國民大會於庫倫，該會最大的結果，是取消君主政體並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議案成立。且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通過新憲法案，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就是如此誕生。

政治機構概觀

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在蘇聯援助下成功的，新憲法也是在蘇聯援助下草成的。這憲法乃以蘇維埃爲基礎，但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因爲外蒙的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太簡單，不能實施馬克思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政權由「大國民會議」行使，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則由「小國民會議」行使，「小國民會議」閉會期間，由小國民會議的常務委員會及政府行使。小國民會議約有議員三十名，每年開會兩次，這兩次會的實權，操於常務委員會和內閣手中，外蒙人、共和國的憲法，第一章是規定國民權利，第二章是規定政治組織，茲將第二章述其大略如下：

一、國民大會，由小國民會議之常務委員會及政府行之。二、大國民會議由總部，都市，農村及軍隊代表組成代表會，每年依照人口比例選舉之。

軍人的令譽，守軍紀，遵軍令，奮發忠勇，守土殺敵！

時代日報

，自應處以嚴刑。我們對於國家這種斷然執法的精神，完全擁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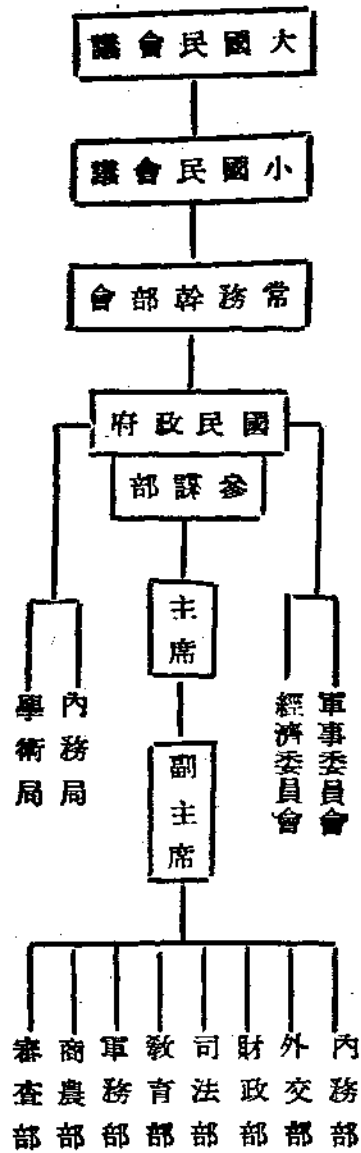
年來國家軍事政治缺點固多，但綱紀不振，賞罰不嚴，是最大癥結之一。而軍紀廢弛，尤爲國家之大患。最近大家所謂士氣不振，實在是將士不振。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主帥疑懼，兵無不敗。而退却之際，雖抗敵無方，殘民有武。此不僅與敵人以長驅直入之機會，也給人民以萬分悲苦的觀感。而因爲他們未得應得之罪，愈使他們無所懼戒了。正如吳起所說：「兵以治爲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這一次蔣委員長將韓復榘氏撤職拿辦，我們不從絕對擁護，而且主張處以嚴刑。這不是對人問題。我們除非萬不得已，何忍主刑？然非此無以警衆。國家存亡所關，不能姑息。魏絳戮揚子，穰苴刑莊賈，都是因爲不能不設而不犯，所以犯而必誅。當年諸葛揮淚斬馬謖，其心中之悲痛，一定還過於受刑的人！

今日無功已算有過，何況臨陣脫逃，營私舞弊？自己不能受這嚴厲試驗者，不妨潔身引退。既負責任

三，大國民會議規定每年舉行一次，由小國民會議召集之，此外，依一定程序可臨時召集議會。
 四，小國民會議由大國民會議選出，其行動對大國民會議負責。
 五，小國民會議係最高行政機關，執行大國民會議之議決案及憲法。
 六，小國民會議每年至少召集二次，選舉五人組織常務幹事部及選舉其他政府官員。
 七，政府執行一般國務，由主席，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

上面是關於規定統治組織的大綱，此種政治組織，完全脫胎於蘇維埃體制，如大小國民會議，常務幹事部及政府的各種組織系統，和蘇聯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幹事部，及人民委員會等組織頗相類似。茲為更加明瞭起見，將其政治機構圖表如下。



與蘇聯之關係

蘇聯與外蒙的關係，源於一九二一年的「友好條約」。這起蘇蒙兩方公文往來的開始，該項條約的內容，除相互承認獨立外，並決定外交機關的交換以及獨立邦交等事項。迨後蘇聯為使外蒙徹底蘇維埃化起見，復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在莫斯科成立蘇蒙秘密條約，不僅予蘇聯以經濟上的特權，復規定紅軍得駐紮外蒙。及至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後，蘇蒙關係更加深切。

「滿洲國」的成立，以及華北方面緊張局勢，更使蘇蒙關係愈加緊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蒙古人民共和國主席兼部長互丹，率軍政部長多米托里等五人，報聘莫斯科，透向蘇聯政府，黨部，軍部各方領袖會見，協議對策，關於構成抗日聯合陣線，據傳有具體辦法的決定。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外蒙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阿摩爾和內閣總理銀東氏，致函加里甫和莫洛托夫文正式請求蘇聯對外蒙予以援助。莫斯科對於這個請求當然樂於接受，於是蘇蒙兩方即開始秘密談判，三月

，便須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政府要以重法作監試之人。而一面嚴罰有過，一面當重獎有功，這是不待說的。

被逮捕記

南京失陷了，敵人渡河了，全國人民沒有一天不在惦念着山東。大家殷殷地期望山東平安，期望山東能予打擊者以打擊。路透社傳說土肥原到山東，我們便不約而同的憂心如搗，那心就好比幾百斤石頭壓上心頭。報載沈鴻烈將軍火燒青島，我們歡喜得掉下淚來。然而，敵人畢竟渡河了，敵人又勢如破竹的佔據了濟甯。

雲霧遮暗了濟甯，我們對於山東的那位「轉青天」，不免由懷疑而怨憤，由怨憤而要「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雖然軍機秘密，小百姓不會懂得，但是至聖先師孔子的血地究竟沒有滴多量的血而被輕輕的放棄了。別怨憤吧，水落自會石出的，公理還是有的。果然某天某要人在開封某處召集軍官訓話了，這訓話好像世界聞名的林肯對將士們的演說。

訓話畢，某要人從容的踱進了辦公室，請韓復榘談話，某要人把韓復榘的罪惡和盤托出，說得韓復榘目瞪口呆。接着就有衛兵將韓復榘扣留起來。當大快人心的一刹那，某要人又召集了韓將軍部下團長以上的軍官，宣佈了韓將軍的罪狀，並囑咐他們要拚命抗戰。其中最緊要的幾句是：

「你們打敵人總是不錯的，軍長不叫你們打，師長就發命令打，師長不叫你們打，旅長就發命令打，旅長不叫你們打，團長就發命令打。」

十三日由蘇聯代表泰洛夫與蒙古人民政府阿庫爾和銀東共同簽訂互助議定書，此項議定書延長十年有效，內分如下四條：

一，蘇聯或蒙古共和國受第三國侵略威脅時，兩國政府即刻共同審查造成的局勢，並採取一切能保障其安全的必須措施。

二，蘇聯與蒙古兩政府在訂約國一方，受軍事侵略時，須互相準備一切的援助，包括軍事援助。

三，蘇聯與蒙古兩政府認為不必要時，根據相互協商，得為履行第一和第二兩條記載的約束，其中的一方駐紮於另一方的領土的軍隊，須即刻撤退，如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退出蒙古共和國領土一樣。

四，議定書以俄蒙兩國文書成兩份，兩種條文均為有效。自議定書簽署之日起，有效期間繼續十年。

以上議定書公布後，我政府曾於四月七日及十五日先後提出兩次抗議，迄今仍為懸案。但據蘇外長及李維諾夫的聲辯，認為蘇蒙議定書的任何條，都沒有損害中國的主權，而對於中國乃至蒙古都沒有領土的野心，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蘇聯與北京政府訂立的條約，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依然有效。

經濟與文化之概況

外蒙雖較荒涼，但並非是一個完全草原和沙漠地帶，除畜產有馬，牛，羊，駱駝外，庫倫北連西

伯利亞山系，林產極富，如樺，櫟，白楊，落葉松等，年產頗多，農業雖為蒙古人所不喜，但在城市附近，也有少量麥產。「自給五年計劃」實施後，利用集體農場，強迫有閑階級，如喇嘛等，從事作業，此後農產量必有增加的可能。

關於礦產還沒有明確的調查，據估計，外蒙的礦藏很富，如納拉伊哈煤礦，埋藏量約五百萬噸，桑貝子以南十二公里的地方，也有豐富的煤礦，科布多則有煤礦三處，他如銀，鉛，岩鹽等礦已在探掘中，至於金礦，則自古有名，埋藏極富。

工業以庫倫為中心，以製革業，製材業，煉瓦業，機械業為主，最近生產率增進極快。家庭勞動的小規模工業，以畜產物為主，此種小工業為數也不少，在工業聯合會統制之下，有粗製毛織工場，皮革工場，製鞋工場，毛皮製造等工場，現時均在五年計劃下，加緊生產。

外蒙「五年的計劃」，最重要的部門，當是交通發展，它原有四大「商隊路」的幹綫，現均重加修建，各路均以庫倫為起點，東到哈爾哈，東南至張家口，西到伊犁，北至西伯利亞。尙有新修的道路，它可遠通西安，直連上海。至外蒙對外貿易，當以蘇聯為主，據統計它與蘇聯的貿易，逐年向上增加，一九二三年為三百四十七萬四千盧布，但至一九三一年竟達六千六百七十七萬盧布，八年的時間，竟有十九倍的驚人發展。

蒙古在革命前，寺廟就是唯一的文化中心，一九三四年以來，發動撲滅文盲運動，整理學校，設

我直接替你們負責，因為你們打敵人總是不精的。」

說也奇怪，一般軍官見到他們司令被扣留了，不特沒有依依不捨，反而興高彩烈。

據聞韓復榘被捕之後，軍事當局在其專車中搜出硬幣一千四百萬元。

又據香港南華日報載：韓復榘業已判處死刑云。（君尚譯，按：現已槍決）

立許多民衆教育機關，學校用品，全由政府支給，男女同學，實施共產主義教育。現有小學七十所，中等學校五所，技術學校三所，且有很多職業學校，識字學校，此外另有庫倫大學一所。蒙古在舊時沒有報紙，人民只閱讀喇嘛所著的經書或日曆，現在已有蘇維埃的報紙，在庫倫刊發五種蒙文的日報和九種雜誌。近幾年來，並建築排演通俗劇本的國立戲院，以灌輸民智識和喚起蒙古的過去為目的。

外蒙軍備的力量沒有確切統計，但其軍隊是機械化的，常備軍的共三四萬人。然在目前恐不肯幫祖國驅除強敵；因為外蒙的軍事行動唯蘇聯馬首是瞻，而迄今日止，蘇聯對日本仍充分表示着妥協的姿態，她對於外蒙的支持，乃是給日本一個警告而已。蘇聯對中國抗戰誠具有同情，然一面則謹慎的避免戰爭。對於自身的安全，及在蒙古共和國的保护權，是決心維持，而馬上就令外蒙出兵抗日，恐未必如此簡單吧！

中國一船樓

Cornelia Spencer女士著
曹沛滋譯

深居華中腹地的洞庭湖，因為她有她特有的美麗，異樣的變幻，特殊的風韻，所以，在湖上的生活，顯然與在岸上的不同；湖上的人們也和其他的鄉下人不一樣。

是在初夏的那天吧，湖邊的一個小市鎮上喧鬧震天，原來是些運輸船隻在忙著裝卸貨物，裝出的是茶，米，菜子油；卸下的是鹽，布，火油以及各色的貨品。各種各樣的船隻集在湖邊，爲了載量忽重忽輕，失去平衡，彼此偶然相撞。擠在船縫當中的那些小艇——舢板渡船——被着槳向在岸上的人們招呼，他們是在兜攬遊湖的客人。

我看看那些小艇，心中在打算：「船都兜攬到生意，祇有那個女人的還空着，那船樓看起來不大壯健，但，只有我一個客人，湖面又是這樣平得如鏡，或許不會遭什麼風險吧？」這樣，看看又沒有別的，那船樓迫切地叫我：「到黃沙堰去吧！到黃沙堰去吧！」我招招手默應了她。

我很當心的踏上了她的小艇，慢對她說價：「四百文，老規矩，是不是？」
「四百文！」她說。「是的，可最今天沒有順風，我又不能張帆，請加些茶錢吧，要是我們到了那裏。」

我注視鄰船上的一家人，他們都蹲坐在那小船的船面上，咬嚼着黑米飯和鹹魚。一個胸部很闊的男人，他的圓面孔的娘子，還有三個小孩子，他們都是很儉儉又儉儉的樣子，五副眼睛又都凝視着我。

我又看到船梢後輪裏，有一燈米，一瓶油，一隻小風爐，一捲衣服和一張鋪位。我早知道她們汲水烹茶，淘米，洗臉，揩身都取給湖，但湖也是他們的潑水地，終於又是飲料之源。他們沒有家，祇有那湖。蓬索上懸着新洗的衣裳。船上面鋪着乾魚，爬滿了蒼蠅，變黑了。一隻瘦倒不堪的貓兒不知在哀叫着甚麼……那便是他們的生活。

好容易擠出了船殼，轉向那茫茫大湖中盪漾，我轉睛凝視着船樓。她瘦得有力，可是給暴日晒得發深褐色了。她那黑油油的髮髻像被火燒過變成焦黃色了，她的皮膚是粗糙而多皺紋。正當我打量她的時候，她打住了她的雙槳，從縮在裏面的小板凳底下，拉出他那竹編的箬帽來——大而圓像一口底朝天的水盆——一根帶子繫縛住他的下頷，再用一根紮住他後面的髮髻。這樣，將她的臉襯得格外瘦削憔悴，雙瞳越發地黑了。憑高地捲起他的一雙藍布衣袖，一幅圍裙緊緊裹住他的外褂，這樣，再划起槳來，他的雙臂瘦得露出了筋節，他的雙手是很小但是很堅韌有力；他那雙小腳上面的踝骨，像兩根乾柴，套在寬的椰子管裏，鬆得像空燈籠殼子一樣。她站在忽傾忽斜的船上盪着槳，穩穩地而又緩緩地。

湖水總是混濁帶着泥棕色——綠油油地湖岸襯着有白有黃的豆花和油菜花，天空又是這般蔚藍眩目。我出神地看着一個漁翁，拉起他的大網，用一具柄竿很長的網杓，掀起那跌撲出水銀白色的被網。

不堪回首話平津申

客歲平津相繼淪陷，迄今已近半年。傀儡組織「中國臨時政府」，並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敵將寺內博一之一手製造下，竟宣告成立！它的政治方面的輪廓，宣稱將要採取聯省自治制，掛五色旗，並誇稱要完成十省自治，改河北爲「直隸省」，改北平爲「北京」，取消冀東偽政權。直隸省內劃分四區：（一）順天（冀東）區，（二）渤海區，（三）保大區，（四）京兆區。一般無恥的漢奸，恬不知恥，還發表「宣言」，代人張目。

敵軍佈置

軍事方面，敵人的總指揮部仍然設在天津，寺內寺一總指揮官，敵軍在華北的很少，據說只有一，三，四，五，七，五個師團星散在各地。平綏線（一月以前），平漢線不過兩萬人，山西方面不過三四萬人。偽名目繁多，有「自衛軍」，亦名「東亞挺進軍」，屬於民團的性質，首領是蔣雁行。有「警備軍」，一部份編成「冀豫挺進軍」，首領是白堅武，已經被我們捉住槍殺，現在的首領是曹和民。另一部份冀東保安隊改爲「警備隊」，首領是王鐵相，因爲鑒於張硯田張慶餘部之反正，全部都取消了重武器，與偽軍調防，其中有三千人開到索倫山一帶築壘。至於滿偽軍調入關內的，有洮南一帶第五軍區的索景清部駐冀東，有第四軍區的教導隊，還有第六軍區張海鵬的兒子張俊哲部駐懷柔。

層的大小魚兒。一條水蛇在波前偷偷地遊過了。近港的湖灘淺處，有些人們在捉蝦，泥漿污及他們的腰部，導們還是氣喘如牛地在跋涉着。這種種，這條件，代表着每個夏天裏的普遍景象。

船讓說話了，可是我想：「我希望他再靜下去，最好讓我隨流入夢，啊，在像這樣好的一天裏！」

「你是西洋來的？」他竟開口了。「四洋——外國多麼富。個個都有錢，用不着做生活」。

「你錯了！」我說。「你誤聽傳言。他們個個都是做工作的——做得很苦，外國也有窮人——乞丐，跛子，瞎了眼的，世界到處是一樣」。

「唔，不是的」，他又說。「那是笑話。他們個個都有錢我曉得的。我也看過許多外國人，他們都是這樣的——身體又壯又胖，有漂亮的衣服穿又有錢花；怕的你看我太窮，故意對我客氣吧！」

他靜了一會兒，午後的太陽分外的熱。他的眼睛半翕着，熱汗從髮邊流下來，粗布褂子黏住他的身體。他的手腕上的筋絡都豎起來像一根根拉緊的繩索。他的呼吸，雖然合律，可是已經急促顫動得利害——但是我們還是徐徐地撥漾着。

我觸起一樁討厭可憐的事情來了，那就是：馬上我們須得繞過一個岬——一座又窄又長突出湖外的岬，又像是分水岬，在那兒，船是很難行的。我頂怕那個地方，因為那兒的水，奔流向無數的方向，又老是游游然在石頭上打轉，要是把槳的一不當心的話，會把你漩到不知道甚麼地方去。此情此景，總是吊在我的腦海裏——雖然我走過這兒好多次——我多次多次都是很太平地渡過這兒，這一次，當然，也不會是例外吧。……

塞地，船讓又打住了槳，我看他不住地回顧着船梢。一粒汗珠從他的一隻眼睛上面滴下來，他很不耐煩地聳一聳肩膀，揩了。一陣呼聲，由遠而近，由模糊而清晰，很快的，打進我的耳門，我也轉過頭來，看看究竟。是一艘外國小鐵艦從靜的湖面掠過，駛向那內地的某城去。牠撕破了湖面，掀起了了一團團的白霧沫在船首過處，顯下的一縷縷低低欲欲的黑烟在後面。正和別的小船一樣，經過這樣很單純的行動波及，我們的船恰巧遭遇着這些迎面撲來的巨浪。船讓忙站穩了，握緊她的雙槳，把定了我們的航程。祇見得疾行艦上的旗幟在微風中飄蕩。我也瞥見船頭船尾的槍砲，甚至於水手們在工作，衣白制服的司令官坐在艦橋上，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鐵艦來得甚快去得也速，大波浪立刻跟上來。弄船的人們，遠的近的，都相互驚叫；艇兒碰撞，鏈索憂憂有聲。一個個都準備迎過浪頭，也招呼船朋友小心，過一會兒，對那鐵艦祖宗八代都罵出來。

一位在我們近邊田裏工作的農夫，也站起來注視着湖上的風雲，他的面孔板起來，很嚴肅的，內心中像有無量的憤慨的怒氣。

白浪兒滾滾，個個迎面打來，我凝視着船讓，那滔滔的浪把我們升到三尺多的高空中，一會兒又將我們扔下來到河槽裏，把我們的船頭大大地沖刷了一下。我按牢我的坐凳，咬緊牙關，不敢驚喊出聲。

這時船讓的面孔，現着艱難，疲厭，雙眼緊閉；用足她的氣力，挽着槳，她的手節骨都緊張得發

寒雲一帶。雖然敵人對於偽軍監視很嚴，但是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在錦州和熱河的偽軍，都發生過很嚴重的反正。

軍事動脈

敵人最近對軍事動脈，更在拼命建造，從張家口到多倫的張多路，已經修築，從灤河入大沽口的灤河亦在計劃開濬之中，承德到古北口和通州的鐵路，在晝夜兼修，大沽口與塘沽是海河入口的咽喉，敵人爲要加強航行的能力，已在計劃着開闢一個北方大港，資本金聽說需要六千萬，現在海河裏的船隻，來往走的本來多數都是掛着日本旗子的船，這一計劃成功，恐怕其他外輪更沒有生意可作了。

文化現狀

談到北平的文化，已遭到侮辱了。北大，師大，清華，女大都住滿了敵兵。燕京，輔仁因爲有外國人的關係，還勉強開着門，也還有些走不淨的學生去上課，可是不是今天失蹤了一個先生，就是明天失蹤了一個學生，也彷彿是屠場裏的羔羊，沒有什麼生機了。中國學院算是敵人培植的一個學校，也在不生不死地存在着，一般教授走不脫的，不得不在那裏勉強敷衍，許多教職員忍泣吞聲地生活着，許多青年也都在度着眼淚洗面的生活。在課堂裏許多課本都換了，有些年青的孩子们們熱烈要求先生講時事，結果先生哭了，學生也哭了！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正是偽組織成立的第一天，敵人強迫我們的青年男女去遊行慶祝，許多人要躲閃不可能，被這着又非去不可，若干學生都垂頭喪氣，拖曳着旗子，無精打采地好像去参加喪禮，完了會，許多旗子被人們痛恨地踐踏在地下，表示不願去作亡國

白了。

「這是西洋兵船」，她說。「這樣快！「鬼嘯」，「鬼嘯」！壞鬼！有甚麼意思呢？捉魚的馬牠，擺渡船也停下來，種田的嘴巴看他們的田禾被浪打平了，牠一點也不管。唉！東洋船，大英船，花旗船——我不知究竟還有多少——一齊來在我們中國湖裏。這是甚麼道理？太太。難道他們不看見我們這些船比他小得多嗎？」她越划越急，大概心裏是在生氣的緣故。

「我不知道呀」，我簡單地回答。「不過，我看他們這樣做法實在不對」。

「是，對呀！妳是西洋人，妳說西洋並不都是有錢有勢！那麼，有沒有中國兵船在妳們的湖裏河裏。像甚麼這兒竟有這些船？是不是爲了打仗？不，打仗不是要消些傢伙？我沒有兒子去打仗——我的男人沒有出息，又沒有膽子。不過，要是打仗的話，我一定叫他去。或者他可以練練胆氣，或者他死了也就算完了。有出息的人才不會去打仗因爲把有用的人一下子打死完，那仗怎麼會贏呢？總之，甚麼打仗不打仗？殺老百姓——搶奪我們——但是我們還是中國人哪！中國不會得抵抗，兵船就開來了……他們都說：「打倒日本呀！抵制東洋貨呀！」真的，去年我替我的孩子做生日，想買一些紅花布，但是沒有不認色的。他們都說「東洋貨」。不過，東洋船到現在還是有。太太，我們不能和妳比，你們外國人和我們中國人不一樣吧？在他們，總是想打勝仗，打得狠，打得兇，佔上風做強手；可是在我們，祇求把肚子混飽，過一點太平日子，讓

的閒空修補衣服，描花樣，或者到廟裏去燒燒香，禱修禱禱一下子。我們不像外國人，我們惱恨打仗——其實，殺死千千萬萬的人算是得勝了又便怎樣呢？但是，我太蠢了，我祇認得東西南北四個字，甚麼東西也不知道。這是天註定的。男人一定要討女人，女人一定要生孩子，孩子又一定要死去。這真是天意，勉強不來的。總是這樣。太太，我有過五個孩子，也求過神，可是我現在連一個也沒有，我空身一人。第一個孩子生下來就死，第二個祇活了三天，第三個是因爲生疔瘡把他餓死，第四個活到五歲，霍亂送了他的命。第五個，唉！小老五，我現在還是傷心。小老五已死了一年。小小的，胖胖的，多麼會笑，那孩子！我隨便到甚麼地方別生，總是帶着他坐在船裏，妳坐的這位子就是給他坐慣了的，我總是打他，用繩子把他扣在板凳上，可是，太太，那沒有用。河閘王等着他。在那一天，正是我忙得不得了的時候，他跌下一邊去了。我看一看那子業已放鬆。我現在還想：一定有水鬼放他下去，因爲我不知道他究竟怎樣跌下去的。但是，那繩子沒有結了啊！……我不會想到他的小手會解結的啊……那天早上，他（指他的男人）打了我。看哪，這些都是傷疤——現在，至少，我是空着身子，不想再有孩子了。唔，我的太太，妳有沒有孩子？丟掉過沒有？一個人傷心莫過於此。我划船，我男人也划船，到了晚，我回到他的船上，一陣怒罵，簡直使我睡不下飯——但是，後來，甚麼也沒有。我知道天老爺註定了我無後，生一個還是再多死一個。男人又是無情，總是說：「沒心孔的呆貨！妳怎麼不看他（註：指孩子）？」一條狗

取。

漢奸團體

敵人因爲採取「以華制華」的政策，所以也組織了些不要臉的醜類團體，最著名的就是「華北青年黨」，黨魁是天津市政府的秘書長劉紹珪，曾在漢奸報紙上，大吹大擂，招收黨徒。後來因爲偽國漢奸入關，將青年黨改組爲「新民會」，設立「新民學院」，訓練製造漢奸子孫，這是一個很大的組織。其次爲「亞洲黎明學會」，是天津駐屯軍部，參謀和知主辦的，現在也大招會員。第三爲「東亞文化協會」。第四是「東亞和平促進會」。此外日本的特務機關又利用了許多中國人在平津設立了許多「宣傳班」，天津一個，北平三個。所謂「宣傳班」，就是變相的偵緝隊。最可恥的，是北平的東北人，也被迫組織「滿洲國」居留民會。

炮烙之刑

敵人嗾使許多醜類來宣揚它的德政，但是德政都是什麼呢？敵人所過的地方，雞犬不留！婦女無論老幼，都有遭受毒污的危險，許多青年婦女都退去面上的脂粉，脫去華麗的衣裳，城裏幾乎看不見摩登女人的影子，晚上街市就斷了行人。城裏裏日本兵營附近，時常看見歪戴着帽子醉醺醺的「皇軍」在敲着人家的門索要女人，許多人家頭一天晚上有皇軍進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聽見哀悼的哭聲了。然而無恥的漢奸却在廣播放送中說有人破壞「皇軍」的名譽。此外還有許多人無緣無故地都被處了死刑。北平路局副局長張作樸，因仇人密害，被敵人用火燒死。

最慘的就是天津的萬人坑，這都是每次由北平火車下來的青年乘客，被敵人拉到憲兵隊打刺刀處肉體爛，體無完膚，而活埋在萬人坑裏去，聽說死的人已經有三千多了！（完）

百餘人，大都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多公務員參加。團的組織設大隊和分隊，分配北戰場工作，有幾隊如今還留在最前線工作。他們的工作範圍極其廣泛，幾乎除了荷槍殺敵外，其餘一概都做。他們的苦幹精神，與待人接物的誠懇謙和，都是值得欽佩的。他們對軍隊和民衆的聯絡很好。我想他們今後在戰地所發生的作用一定比目前更爲廣大。據該團某大隊長說，服務團的工作方針有可注意的四點：①他們不懷成見，利用舊有的組織，不另編新隊，以減少摩擦，集中力量。②指定人不做會做，人已做我不再做的宗旨。③調配當地優秀份子和純正士紳繼續負起本地救亡工作責任，以免在戰地服務團離開某地後即有人亡政息之弊。④宣傳方式捨棄以往種種傳單標語和民衆大會等形式，而採用個別訪問的方法，先判斷保去說服一村中的領袖，發生效力以後，再使他廣爲宣傳，務望敵亡知讎家破也。人人知道衛國抗敵。

基特教育青年會全國協會從前於長城綏遠兩次戰役會組織戰區服務團。這次自滬滬橋事變發生，又組織了更廣大的全國基特教育青年會軍人服務部於華北，華東，華南三區。華北區本部設於鄭州河北治樂公會內。該部的工作對象正分爲：(一)移動中之軍人，服務中心側重軍車招待，地方指導，風紀維持，以輔助生活便利爲前提。(二)戰線中之軍人，服務中心側重精神訓練，戰地常識，協助運輸，以振奮抗戰爲前提。(三)後方中之軍人，服務中心側重創傷治療，恢復健康修養心志以維持其後方紀律爲前提。至於工作事項，分割爲關於軍事教育者，關於生

活指導者和關於心情修養者三類，都是很實際的工作。現在華北區本部的總幹事是前任北平青年會總幹事蕭奉元。在華北區工作的同志總共有八十人，分爲八隊。據蕭氏談，該部工作以往注重消極方面，對象是醫院中的傷兵。他們的工作是給以精神的安慰，娛樂的調劑，寫信等事。如今他們漸轉向積極方面，以抗戰前線上的將士爲對象，灌輸以精神上的鼓勵，以求士氣的煥發。青年會有種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他們到某地開始工作，絕不找與服務對象無關的人和機關，來作無謂的交際。

在前方，這兩個服務團體是比較最能切實工作，而值得廣向後方介紹的。華北一部份新聞記者組織了一個「華北記者戰地服務團」。他們的宗旨，一方面是以國民的立場，盡戰時服役的任務；一方面是以報人的立場，盡新聞的報道。他們希望能有四十個團員，分配到各部隊隨軍出征從事工作。現在已經有幾位團員在黃河北岸的各游擊部隊中活動。除了該團的團員以外，中央社和武漢各報社的戰地記者也常在那裏聚會，這差不多是報人的一個俱樂部。中央社的電台便設立在裏邊。記者服務團的團長何冰如是一位華北報界的老前輩。

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校正在鄭州招生，報名者達三四百人。這數目在較大的都會內並不是奇，但以鄭州這樣比較文化落後的內地而講，這也就驚人的哩！記者走進他們的報名處去觀察，在一小客棧內隨背相接，許多是公務員，商店僱員，軍人，當然佔大多數的仍是學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童子軍裝的小學生也來參加。這些十二三歲的孩

子，竟不畏千里跋涉的勞苦，爲了民族解放的爭取，這精神是足使大人慚愧的。民族革命的辦宗旨，據該校負責人說：「現在敵軍深入，國難嚴重，非集合有志青年，積極訓練，長期抵抗，不足以挽救危亡。司令長官閱有見於此，特設民族革命大學，造就救亡幹部」。現在山西關於軍事政治的訓練組織，計有：①隨營學校——軍官教導團。②學生游擊隊——新的學生的自動參加軍隊從事游擊戰爭工作的。③民族革命大學——以前是第二戰區軍事政治學校。現在擴充爲大學，高中，初中三部份。校長由閻錫山自兼。修業期間不加限制，全視學生程度高低與能力大小，而決其在校學習的暫久。學生在受訓期間除了衣食住一切均由校供給外，每月津貼三元的生活費。至於畢業之後，則與教授一樣，不分階級，一律平等待遇。據說，該校教授的薪水，至多不過二十元呢。

上海的孩子劇團新年時正從徐州來鄭。閩海鐵路特別黨部想爲他們籌些款，特於一月四五六三日在閩海禮堂主辦了一次公演。公演的節目有「捉漢奸」，「仁丹發子」，「夢遊北平」，「幫助門的游擊隊」，「街頭」，「火線上」，「最後一課」等劇，和歌詠，舞蹈，口琴獨奏，雙簧，該團的領導者傅承茂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兒童。他在台上報告說：「我們這一羣流浪的後子，八一三的時候在上海的難民收容所中，感覺到收容所內生活的平凡乏味，同時看見抗戰將士的英勇奮鬥，所以就發動了這樣一個團體，用歌詠與戲劇作爲喚起民衆的工具，以盡小國民的天職。」音樂指揮也是一個小孩了，名字叫徐晴。記者看見了這般熱血的兒童，一方面自然是欽佩，同時更想到中國的前途正有無限的光明！(一月十四日)

一個外國人在虹口火線中的日記

張常譯

九月來矣

九月一日——復轉平靜。在下浦路日本墨水商人處獲得報紙一份及沙丁魚二罐。彼係一義勇隊。食番薯及沙丁魚。

九月二日——晨，小有接觸，旋即平寂。天氣甚熱。水電工人來函檢查電表。清道夫亦來稍加掃除。

九月三日——上午，身體不甚舒適，旋覺不能支持，病矣。諸犬甚多。全日砲火甚烈。寓所窗門被來復槍彈擊一洞。日本軍艦向浦東中國軍隊加以砲擊。

九月四日——早餐時，空軍前來「下蛋」甚近。多處起火。吾犬「地笛」今亦為巨砲所驚。吾已不再愛彼等。午前午後轟炸尤烈。入晚，近處實靜，但聞遠處槍聲而已，戰事或在吳淞方面。今日無工部局工人來此掃除。想為昨日之砲擊所驚怖。

九月五日——全夜平靜無事。睡眠甚安。犬中有名布斯德者已受驚而四日未進飲食。全日平靜，入晚稍有射擊，劈柴少許。電及煤氣均斷。

飽聽轟炸

九月六日——黎明時，有重炮遠射。全日平靜。悶熱。不再念及此間近處尚有劇烈戰事。戰事或在吳淞江灣間展開。對飛機在投彈時迅速昇降之聲，業已飽聽。此項聲音，較砲彈在空中穿來，而前聽其落地爆炸聲為尤劣。

九月七日——昨夜安靜，今晨亦未聞炸彈聲。下午及晚間則有強烈砲戰。以余推測，大約正進行總攻擊。天氣熱悶，似將雨而未降。往購青豆未得。

九月八日——上午，天氣轉涼，戰事繼續不絕。在有恆路郵局寄出至美國信件二。不知此信能到速否？

九月九日——昨夜近處遇空襲。此間未受損害。報紙入目時，已甚憂。彌掃屋宇，現余已成一家庭內之清潔工人。

九月十日——天涼而多雲。吳淞至江灣一帶有砲戰。雙方均無進展，浪費軍火不少。

城門失火

九月十一日——購得煤一筐。日夜均有空襲，但此間未有損害。北四川路上海大戲院對門轉角處大火。

九月十二日——昨夜有中國空軍來襲。日本攝影師 AGASAWA 昨日在吳淞前綫攝影時為槍彈所傷。傷勢不重。日本海軍陸戰隊守備兵及譯員，來此察看居此者係何人。增談後即往向其長官報告。

旋來告云：「一切無問題，隊長謂汝可居留此地。」朝鮮人在老靶子路公園堆積沙袋。

九月十三日——潮濕煤發已屆一月。將展長至何時，甚難斷言。中國方面之堅強防禦戰遠出日人想像之外。因此目下日軍不得不大補補充。待每次

從上海到武漢

施仁政

一 別矣上海

十月二十一日的下午，我纔知道被調到外埠工作的消息。購置了規定的物件，匆促地趕到四站。候了許久，忽見車站上掛出了「京滬客車，暫行停駛」的牌示。這樣，我們雖只好失望地回來，但我們是受依限「報到」的，盡了最大的努力，始設法借到四輛公共汽車，在二十四日的晚間八時，我們一行六十餘人乘車向西行進。

當時，我真感憤萬千！當我腦海正在回念上海時，迎面突然來了三個照明彈；我們的車子為了避兔目標，暫時停駛，大家紛紛向附近田野間躲避。計自徐家匯至虹橋機場的短短路程中，我們共下車了四次。

雖然月光是分外地光明，但以汽車不能開燈，對開的車子又那麼多，所以速率是異常慢。因此，到了我們的目的——蘇州，已經過大天亮了。

二 在蘇州

我是奉了軍事委員會第X部，派往蘇州第X辦事處工作的。我們的辦公地點，是在韓家巷上的鶴園，雖然那裏有的是樓閣，亭榭，池沼，假山和草坪；可是在此抗戰工作緊張的期間，那有閒情來賞玩呢？

敵機不時來襲，已成了司空見慣。敵人轟炸的目標是交通樞紐的車站和蘇州城內的繁華地段。曾有一次，散下荒謬的傳單，限吳縣城的老百姓統於三日內遷出，否則就要把全城炸燬。其實，享慣了清福的所謂有閒階級的人們，早就逃跑了，留在城內的只是軍隊和公務員——當然尚有一部份小商

人們彼等之援軍到達時，必有種種不同之理由，對外發表。彼等現在吳淞及沿黃浦一帶登陸。全日除數次空襲，黃中國內地有數處起火外，甯靜無事。晚間小雨。復遷至樓上居住。

病魔來擾

九月十四日——昨晚全夜下雨，但無戰事。今晚及深夜稍炮聲甚厲。意大利薩伏埃守備兵從 ADDA 橋抵滬。

九月十五日——雨。今晨戰事激烈。屋漏又逢連夜雨，致忙碌不堪。烹飪不甚得法。晚間，感覺不適。

九月十六日——砲火停止時，下雨。往訪日本攝影師 NAGASAWA。子彈自其左肩穿入外衣；毀其攝影機之一角而入其左胸。傷勢並不甚重。余已染疫氣。

九月十七日——「陰雨纏綿」。平靜，或因地位不宜作戰。在醫院日本醫生 Kihara 處注射防疫針。兩日後當須再打一次。日夜感覺不安。日軍當局已准許西人及日人在虹口區家中將衣物取出，傢具不在其內。

九月十八日——晨，依然下雨，仍覺不適。昨夜中國空軍頻來此轟炸。中國飛機一架在楊樹浦被擊落。明日美國運輸船學德號將由經大理石頭駛軍艦護送來滬，載有海軍第六陸戰隊一千四百三十五名。統率者即係昔日在滬之第四海軍陸戰隊之皮蒙德將軍。目下上海有美軍三千人。

九月十九日——來虹口搬取衣服及被舖者數千人。華人則不准入內。全日平靜。仍覺不適。被擊

落之中國飛機以卡車裝載，在虹口菜場前展覽。今日為中國「中秋節」，但此間無華人慶祝。

九月二十日——又是一夜不安。今晨雨止，天氣轉熱。數鮮婦來此收拾其逃亡時遺留於樓下之衣物。

九月二十一日——注射第三次防疫針。望其不再如第一次使余不適。日夜安靜。不知戰事已移往何處。又雨。日本方面宣稱，今日將轟炸南京。

天羅地網

九月二十二日——往吳淞路日本藥房購阿斯匹靈藥片及頭痛粉。威脅南京之大轟炸並未實行。駐京各國大使大為驚恐，彼等現遷居泊京軍艦。

九月二十三日——甚安靜。目下附近已無多數日兵佈防。此地似已放棄。轉角處之沙袋及鐵絲網已完全佈妥。全日未見一飛機。

九月二十四日——仍安靜。精神漸好轉。日本空軍轟炸南京及漢口。

九月二十五日——天氣甚熱。在菜場日人處購得豬肉及蔬菜少許。於是菜單始得更改。有小接觸。入晚，中國空軍轟炸機一架飛經黃浦江沿岸。一時無法躲避日軍之探照燈及閃光。

九月二十六日——精神大佳。天氣較涼。今日係余之生日，余亦無心於此。稍有戰事。赴菜場購得雞蛋數枚，擱上僅專為供應之日人菜攤四五。

(未完)

我們出來的目的是什麼？所以我們的同志們仍是若無其事在打緊地工作。

我們工作了幾星期，因了我軍以戰略關係暫時退出了蘇州，我們的工作地也就隨着軍隊而遷移於某地。

三 首都的景象

我們的機關隨着軍隊遷移到某地繼續工作後的三日，忽然又奉命調到漢口；爲了要報告我們工作的經過，會遇到了不少的困難，匆促地趕到了首都。

遷都本來是政府爲了長期抗戰的一種堅決的表示，同時也是政府預定計劃之一。可惜對於交通工其的管理和配備，似乎欠周密。機關的公物，逃難的同胞，統統擠在車站和碼頭上，秩序的紊亂，自可想見。民衆呢，聽到了國府西遷，好像敵人立刻要到了，因而而不計利害，拖男帶女的一闖而走。可是那兒來這許多車和船呢？有時在各輪局的棧船上，往往靜候了五六天仍是不得上船。

因此，如果說是下關是個商埠，毋寧說是一個「人窩」。有許多聰明的人，竟想法乘車到鎮江去上船，有些由津浦路循海路經平漢路到漢口，這的確是無辦法中的辦法。然而誰使我們的同胞受這樣流離的痛苦呢？敵人！可痛恨的敵人！

四 到武漢

在夜神的懷抱裏，船兒緩緩地向上流行駛；人真是所謂「活神仙」，我已到了漢口。

我對於武漢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擠」字，碼頭上，旅館中，甚而浴室和理髮店，無不如此。

唉！在這「擠」的環境中，我有這樣一個懷疑——爲什麼跑到戰區後方的武漢來的懷疑。這的確是看不到敵人的殘殺，我的內心愈痛！愈憤慨！